

澳門教會人士對政教關係的關注

張思敏

引言

余振博士的「九十年代澳門大眾政治文化縱向研究」，清楚揭示了澳門普羅大眾對政治參與的不熱衷、對澳葡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對民主觀的不瞭解。可以說，結果充份反映出澳門人對澳葡政府的不滿，特別是未能對振興經濟、捍衛和平，以及維持治安等方面採取有效措施。

這個回歸前的政治現象孰好孰壞，實在值得深思一下。澳門天主教會歷來與澳葡政府關係密



切，澳人的政治冷漠，對這種政教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澳門教會在回歸前後，如何在社會上定位，以及其與未來特區政府的互動關係及與中國教會的伙伴關係等等，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澳門天主教會與澳葡政府的關係

一五七六年，教宗額我略十三世正式頒令成立澳門教區，並成爲自十五世紀以來遠東第一個主教區。一五八一年，教宗委任的沙主教(Mgr. D. Leonardo de Sa)正式到任⁽¹⁾，開展了葡籍主教統理澳門教務的歷史。

長期以來，澳門天主教會與葡國政府保持著密切良好的關係。一五六零年，居澳葡人自行選舉產生了駐地首領，組織了自治機構協調葡人在澳門的事務，奠下議事會的雛形。到一五八三年，議事會正式產生，而總督、大法官和主教分別是議事會的當然議員，各人領薪1000至2000金幣。查主教更曾於一八零四年兩次膺選澳門護督⁽²⁾。回顧早

期的議事會的組成，足見天主教會在當時政治處境的重要性。

政治轉易時期華籍主教的新措施

澳門教區自一五七六年以來，曾有多段輝煌的日子。在開教半世紀後，澳門教友人數曾一度高達三、四萬，可是很快又減少至數千人⁽³⁾。經過幾度浮沉，現在全澳共有一萬九千多天主教徒，分屬六個堂區。教友當中，以中國籍爲主，也包括葡籍和其他國籍的教友。

林家駿主教是澳門開教四百多年以來首任華人主教。林主教在一九八八年就任澳門教區主教時，正處於澳門政治變易的關鍵時刻。無疑，在澳門回歸前後，天主教會必須明確界定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社會的承擔。

林主教於一九九九年初在一份天主教報章表示，教會面對轉變的態度是不卑不亢的，面對轉變時要眼望將來，首先要自己做得更好⁽⁴⁾。

面對政治變易問題，林主教積極培養本地人材，包括推薦國籍神父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並鼓勵設立兩年制大專程度的「教理教師課程」和「教友神學課程」等等。林主教開始培育接班人，他相信給予年青人學習機會，充實自己是教區未來發展的希望。

澳門的橋樑角色

中西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但是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始於明朝時代耶穌會士的東來；很多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大陸傳教前，都曾居澳學習中文。可以說，在早期文化交流上，澳門天主教會擔當了重要的橋樑角色。

回歸以後，澳門所扮演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橋樑角色呢？會否跟香港教區一樣可以維持到一定的橋樑作用，繼續為中國內地與普世教會互通消息？林主教表示，作為姊妹教會，澳門應比從前更加開放，增加教會的透明度；並同時擔當人格培育

中心 (human formation centre) 及傳教中心 (evangelization centre) 的角色^(五)。在這個前題下，澳門教會才可以更加走入人群。

教區與未來特區政府的關係

一九八七年，中葡雙方達成協議，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六)，標誌著四百多年殖民地統治的終結，並結束了歷史上遺留下來最後一個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說：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干預宗教組織和教徒同澳門以外地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及發展關係，不限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

宗教組織可依法開辦宗教院校和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宗教組織開辦的學校可以繼續提供宗教教

育，包括開設宗教課程。

宗教組織依法享有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繼承以及接用捐獻的權利。宗教組織在財產方面的原有權益依法受到保護。

一般人所擔心的，是中國政府能否全面落實上述基本法的宗教信仰自由條款。但對於這點，教區首牧林家駿主教則持有相當樂觀的態度，並表示一切不變^(七)，即澳門教會將與特區政府繼續維持澳葡政府般的良好關係，而他亦相信在本法中列明的宗教信仰自由定能具體落實。

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的矛盾

政教分離與政教合一向來是教會內一個爭拗的焦點。究竟怎樣才算合宜的政治參與，而又不損政教分離的原則呢？歷年來，天主教會對於社會問題的看法，可見於歷屆教宗發表的社會訓導，「……每一個基督徒都對建設公義和平的社會有責，但這份責任不是純感性行爲，而必須有客觀的

分析以及基督徒立場作爲行動的方向和指引，……」^(八)而關於天主教與政治的關係，教會的主張更是明確清晰。梵二在「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四章中很具體地說明，大致可分爲三大點：

- 一·教會應參與政治生活，尤其要妥善運用其自由投票的權利和義務；
- 二·教會認爲那些爲服務他人而獻身於國家，並接受公務員責任者，是值得尊重的；
- 三·教會決不能與政府混爲一談，並不能與任何政治體系纏在一起，因爲教會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記及監護者。

澳門教區在回應上述三點時，堂區聯合工作小組（簡稱「堂聯」）^(九)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堂聯」在教育教友參與政治生活上充當了教會導師的角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教會是不能與政治體系纏在一起。

教會在社會的臨在

現時教會透過各種社會服務和教育工作，在社會各階層顯出其臨在的表徵，唯獨欠缺在政治參與的聲音。有人歸咎於教區沒有成立地區性的正義和平委員會（簡稱「正義」）。但林主教指出，「堂聯」已經擔當了「正義」的角色；而《澳門觀察報》的創立也是教會對外的一個表達途徑，特別是對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思。

但「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則表示，在沒有「正義」的情況下，有時候明愛在政治層面上也要扮演「正義」的角色，但基於身爲一非牟利慈善機構的負責人，他個人在很多事情上也不能太高調，避免影響明愛的正常運作。作爲基督徒，他亦同意應多參與政治事務，他個人就是第一個報名參加澳門特區第一屆推委會選舉的。

有人認爲，林主教於一九八八年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不恰當的，因爲這樣

會予人教會與政治扯上關係。但林主教表示，參與草委並沒有違背教會原則，因爲草委會只屬諮詢性質。林主教對政治參與所採取的是肯定和積極的態度，他同意只要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教育的課題，他定會積極參與⁽¹⁾。

政治參與的限制

政治參與的限制可以是多方面的，當中涉及到的包括人民的素質、歷史背景、周圍環境，以及自身的生存發展空間。

從歷史背景出發，葡國政府基於殖民主義的心態，一向不重視澳門的教育工作，因此造成人民就學水平比較低。根據一九九五年統計數字顯示，勞動人口中小學或以下程度者仍佔百分之五十四，而有大專或大學程度的則只佔百分之五點五⁽¹²⁾。

而澳門普遍的政治文化不足也影響了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其實，公民教育資源有限，而且並未被列入學校的正規課程，因此很多人也不能有效直

接地體察各人的公民政治參與權，因而削弱了具體落實執行的依據。潘志明也不否認，現時一般政治意識低、公民教育缺乏，但他表示在一些天主教學校已開始鼓勵學生多關心政治，希望能起牽頭的作(十二)用。

那麼，教會可以扮演甚麼角色呢？鼓勵關社又是否政治參與的一個出路呢？「堂聯」的功能又能否完全替代正委呢？

結論：澳門教區的展望

澳門教區現有堂區六個，而在教區內參與工作的神父有八十七人、修士十三人，修女一百七十九人(十三)。在面對當前聖召短缺、本地神職呈老化的挑戰下，基層教友的參與更形重要。因此，林主教更加致力培育新時代的教友，「教友神學課程」正是這方面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筆者相信政治參與最終是要依靠民間自發性的推動，但教會內部的推展亦不能忽視。一直以來，

澳門天主教的歷史就是由政治、文化及宗教交織而成，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筆者相信澳門天主教的發展會繼續受到這三方面的影響，但願澳門教會充滿聖神的恩賜，並能回應時代的徵兆。 □

註釋：

(一) 參閱林家駿著，「教區掌故——從澳門教區歷任主教說起」，《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編製。

(二) 參閱劉淑珍、鍾志堅、陸萬海合著，「澳門天主教與一九九九」，《鼎》50期，聖神研究中心出版，頁4。

(三) 參閱林家駿著，「教區掌故——日漸茁壯的澳門華人地方教會」，《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二)》，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編製。

(四) 「澳門天主教教區的展望——訪教區林家駿主教」，晨曦教會新聞，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一

日，第五期。

(五) 1999年11月22日林家駿主教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述。

(六) 《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七) 1999年11月18日林家駿主教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述。

(八) 余穎思編，《道在政綱中——從教會訓導分析社會現況及建議改善方向》，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1995年7月，頁ii。

(九) 堂區聯合工作小組，簡稱堂聯，是澳門教區於

1989年成立。堂聯由六個堂區的本堂神父所組成，目的是協助堂區牧民和教育培育的工作。

(十) 1999年11月22日林家駿主教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述。

(十一) 馮邦彥著，《澳門概論》，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頁377。

(十二) 1999年11月22日潘志明先生接受筆者訪問時所述。

(十三) 資料來自 Lancelot Rodrigues, "The Church of Macau After the Handover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ao on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October 29 and 30, 1999.